

中国的和平发展 与海上安全环境

冯 梁 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军队“2110工程”专著
JUN DUI 2110 GONG CHENG ZHUAN ZHU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

冯 梁 高子川 段廷志 著
郑雪飞 张 春 梁 巍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 / 冯梁等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12 - 3905 - 4

I. ①中… II. ①冯… III. ①海上一国家安全—影响—
发展战略—中国 IV.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5849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张 琨

书 名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
Zhongguo de Heping Fazhan Yu Haishang Anquan Huanjing
作 者 冯梁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千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25¼ 印张
字 数 4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6 月第一版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905 - 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及人类共同发展。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海上安全环境。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海上安全环境的和平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保持海上安全环境的相对稳定，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国家海上安全环境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处海上空间各要素之间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客观状况，通常包括海洋战略区内自然地理状况和国家间政治、军事、经济相互作用情况。海上安全环境是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的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之一。从历史上看，海上安全环境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历经了一个从弱到强、从小变大的过程。明代以前，中国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陆上方向，海上安全环境总体稳定，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影响有限。从明朝开始，倭寇与欧洲殖民者不断骚扰入侵，中国开始面临海上方向的安全威胁。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从海上入侵中国，中国海防危机频发。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海上门户洞开，海上安全成为国家安全软肋。海上安全环境恶化，成为中国一步步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宣告终结。但是，海上方向仍然是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和威胁的重要方向，海上安全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紧张，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禁锢着国人的思想。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海上安全环境得到了重大改善，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然而，制约和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问题没有得

到根本解决，“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洋，决定了海上安全环境的稳定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影响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内外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21 世纪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海洋世纪”，海洋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进一步增大，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正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间围绕海洋利益展开的竞争和斗争也更为激烈。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面临着同样问题。其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 1996 年对中国正式生效后，中国可管辖海域范围扩展至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乃至 200 海里至 350 海里的外大陆架海域，海洋权益较为集中的近海海域，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依托。中国在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北冰洋等也享有相应的权利，需要进一步维护。再次，随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数条通向贸易对象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海上战略通道需要保持畅通，不断增大的海外投资亟待保护，海外侨民利益也需要呵护。国家利益所涉的海外区域，已成为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解决内涵日益丰富、范围空前扩大的海上安全诸课题，事关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兴衰。

然而，受海洋地理条件局限和复杂历史因素影响，中国近海海洋利益频频遭到侵犯，并在特定时期诱发程度不同的海上问题，而在远海，中国安全利益风险增加，挑战和威胁前所未有。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海上安全的筹划已不能囿于近海区块，而应瞄向更广范围；不能囿于眼前目标，追求短期效益，而应面向未来发展，谋求长远利益；不能短视局部，而应着眼全局，谋取未来。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坚持“和谐世界”理念，高举“和谐海洋”旗帜，推进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安全观，用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理念来指导战略筹划和具体行动，成为中国迈向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紧迫要求。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开展了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课题的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本书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为经，以海上安全环境为纬，较为系统和深入地考察了国家发展道路与海上安全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探讨了塑造和平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以促进国家和平发展的总体思路。

中国正在不断走向世界，海上安全环境涉及的空间范围也在向全球

区块推进。作为宏大的战略理论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也成为动态演变的现实课题。本书主要选择了周边海域安全环境作为重点，尝试探索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学界同仁有更多力作问世。

课题组

二〇一〇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大国发展进程中海上安全环境考察 / 1
第一节	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 / 2
第二节	主要大国崛起过程中海上安全环境考察 / 5
第三节	小结：国家发展道路与海上安全环境 / 30
第二章	中国发展道路与海上安全环境之历史回顾 / 36
第一节	古代中国发展道路与海上安全环境 / 36
第二节	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与海上安全环境 / 67
第三节	冷战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与海上安全环境 / 74
第三章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海上安全环境 / 84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 / 84
第二节	中国海上安全环境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影响 / 95
第三节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对改善海上安全环境的作用 / 106
第四章	朝鲜半岛方向的海上安全问题 / 116
第一节	朝鲜半岛方向海上安全问题产生的战略背景 / 117
第二节	朝核危机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影响 / 125
第三节	朝鲜半岛方向其他海上安全问题及其对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影响 / 132
第四节	关于东北亚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 / 136
第五章	东海问题与海上安全环境 / 157
第一节	东海方向海上安全问题产生的战略背景 / 157
第二节	中日钓鱼岛问题 / 164
第三节	中日东海划界与油气资源开发问题 / 176
第四节	东海问题的发展对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影响 / 183

第六章	台湾问题与海上安全环境 / 186
第一节	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 / 186
第二节	台湾问题与当代中国海上安全 / 192
第三节	台湾问题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影响 / 207
第四节	关于战略机遇期内稳定台湾问题的对策思考 / 218
第七章	南海问题与海上安全环境 / 225
第一节	南海问题的历史演变 / 225
第二节	南海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 / 228
第三节	后冷战时期南海安全形势的变化 / 233
第四节	南海安全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 / 239
第五节	关于战略机遇期内稳定南海安全环境的思考 / 245
第八章	海上通道安全问题 / 249
第一节	海上通道安全与近代欧洲部分陆海复合国家兴衰 / 249
第二节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历史演变 / 255
第三节	海上通道安全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262
第四节	中国海上通道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 / 265
第五节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面临的挑战 / 272
第六节	维护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方式 / 276
第九章	新时期中国海上安全战略 / 282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海上安全战略的定位与框架 / 282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海上安全战略的形势评估 / 286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海上安全战略的目标与任务 / 294
第四节	新时期中国海上安全战略的方针与原则 / 296
第十章	加强和平时期海上力量运用 推进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改善 / 304
第一节	推动建立亚太海上信任措施 / 304
第二节	亚太海上军事安全合作 / 321
第三节	加强中国周边海域军事安全合作 / 334
第四节	海上军事危机的处置与管理 / 339

第十一章 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海上力量发展 / 354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海上力量发展的辩证关系 / 355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海上力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 366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海上力量发展的战略构想 / 372

第四节 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海上力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380

参考书目 / 386

后 记/392

第一章

世界大国发展进程中海上安全环境考察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大国兴衰就像大洋中的潮起潮落一样，属国际社会的正常现象。影响大国兴衰的因素有许多，但基于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海上安全环境，则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从一般特征来看，世界各国依据地理位置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四面环海的海洋型、四面陆地的内陆型和既有海洋环绕又有陆地接壤的陆海复合型。不同类型的国家，因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同，所受威胁来源和威胁程度也完全不同，国家安全重点和战略重点存在着较大差异。从概念上看，安全作为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有三层含义：没有（或者免于）危险；不受威胁；没有（或者免于）恐惧。人们常说的“安全状态”则包括两个方面，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客观方面是指外界的现状，而主观的方面则是指人们的心态；亦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① 一个国家要生存，除了必须具备安全的国内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安全的国际环境，必须保证本国居民、领土和政权不受外

① 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

界侵犯，保证本国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正常的商业往来并在世界多种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持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而本章探讨的海上安全环境，则是指海洋型或陆海复合型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基于海上空间各要素之间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海上方向的利益所面临的安全状态。海上安全环境通常包括海洋战略区内自然地理状况和区内国家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情况，它是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之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外部因素，对国家的生存与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追求和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海上安全环境是海洋型或陆海复合型大国在崛起历程中孜孜以求的目标。^①

第一节 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

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海上安全环境对一国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评估海上安全环境、优化海上安全环境，成为世界上主要国家崛起历程中首要考虑的议题。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自然特征和国民基础、国家实力及海上力量对比、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国际环境等。

第一，自然特征和国民基础。自然特征包括国家自然形态、地理的典型特点、领土范围及构成，国民基础主要反映在人口数量及国民的海洋意识和素质两方面。^② 自然特征是一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先天重要因素，主要反映在：一国从地理特征看是海洋国家、陆海复合型国家，还是大陆（内陆）国家，是否拥有具战略意义的海峡、半岛或岛屿，是否靠近主要的贸易通道，是否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本国海岸线及地理特点是否促使或者逼迫国民向外发展、“讨海”为生（例如荷兰、葡萄牙）；人口数量（热核兵器时代之前）、人口素质、资源及其他权力因素是否匹配于本国领土的大小、海岸线的长度、海防的难易程度。

① 相关论述可参见张炜主编：《国家海上安全》“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环境”章节内容，海潮出版社，2008年版。

② 自然特征是影响一国海上安全环境优劣的先天直接因素，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马汉的“海权论”中被给予了充分肯定。本文此处参考了马汉“海权论”中的相关论述，详见 A. T. 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一章“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安常容、成忠勤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14页。

一个国家若面积太大，但与人口、资源不成比例，其防守密度低，国家的危险性增高，广袤的领土反而可能成为弱点。相当数量的从事航海业人口和国民对海洋及其重要性具有较高的认识也是国家海上安全环境的重要基础。一般情况下，追求海上安全环境优势的国家必须要有相当高比例的直接参加海洋生活（包括造船业、海上贸易在内的海上经济、能源、生态、科考、军事等诸多领域）的人数，而且国民的海洋意识和素质，特别是对海洋与国家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认识极为重要。若非如此，则人民及其政府对海洋事业便难以形成强烈的推进欲望，向海发展无法成为国家意志。

第二，国家的海上安全理念。近代历史上，人们把海洋作为国家的安全边界和安全屏障，力图把敌对力量防范在国土之外，主要以强大的海上贸易所推动的经济实力发展海军力量，再以海军力量确保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海军——海上贸易（经济实力）——殖民地三者相辅相成，几乎成为近代国家发展的特有现象。这种安全理念以制约和压倒对方为基础，认为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近代以来陆续崛起的强国大多以建立海上霸主地位、追求绝对优势的海上安全环境为目标，利用本国的海上实力，确保海上贸易的顺利发展，拓展海外殖民地，占据比较有利的半岛、岛屿和海峡等有利位置。奉行此种安全理念，很容易引发冲突、挑战与争霸战争，使海洋成为国家厮杀的战场。因此，近代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奉行此种安全理念的国家最终较难获得真正、持久的安全。

第三，国家实力（包括海上实力）及制海权对比。国家实力、尤其是国家的海上实力，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国家海上安全环境的后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海上实力是一个历史概念。近代时期，它主要由海军力量和商船队所组成。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上实力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包括国家进行海上远洋科考探索、获取远洋和深海资源的能力等。从历史上看，海上实力与制海权虽然内涵不同，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海上实力以海军力量为代表，它是绝对的，而制海权是指相对于他国而言国家对海洋的控制能力的大小，是相对的。海上实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制海权的获取和拥有。海军力量以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制海权能力，是国家获取良好的海上安全环境的充分条件。只有拥有强大的海军实力和畅通的海上交通线，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国家综合实力对比所形成的

海上力量格局既是一定时期一国海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深刻影响着海上安全环境的长远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海上实力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增多，国家的港口、码头、海上航运能力、海洋科考力量等都逐渐进入了海上实力的范畴。而制海权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其空间范围从马汉时期纯粹的水面制海，转变到信息化时代的五维空间^①，制海的对象也从传统的对某一海域的绝对和相对的控制，转变为构筑海上秩序、形成足够的海域战略影响力等。相应的，海上实力和制海权对海上安全环境的影响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变化。在现代条件下，一个国家获得海上强国或世界大国所需的相对有利的海上安全环境，除了海上实力外，还必须对海洋制度和海洋秩序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第四，国家海洋利益及国家向海发展的战略^②。国家海洋利益是国家制定海洋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家向海发展的战略，功用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所有可利用的海上军事、政治、经济和软实力资源，以达到相应的海洋发展目标。国家向海发展的战略制定固然要以国家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在内的客观条件为基础，但一旦确定必将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优劣，并牵引国家对海上安全环境的不懈追求。从总体上看，国家对海上方向利益的认识和界定存在着一个不断扩展和延伸的过程，影响着国家向海洋发展的战略、海洋政策。不过，不同地理类型的国家对海陆安全的要求会有所侧重和不同。海洋型国家以外向发展为主要特点，为确保国家海洋方向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拥有较好的海上安全环境显得尤为重要。而陆地型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则具有防御和内向（或者有局限性的外向）的特点。陆海复合型国家则需要陆海兼顾，尽管不同时期其国家利益重点不一，战略侧重点相异，对这种地理类型的国家来说，至少在理论上，海上安全环境与陆上安全环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第五，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海上安全环境的追求，或者说国家把海洋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区域和持之以恒的战略方向，需要一国相应的政治、经济体制或模式作为保障。从政治体制看，从古希腊的科林斯、雅典，到迦太基和罗马，再到中世纪的威尼斯，近现代的

^① 包括水面、水下、海域上空、太空和电磁空间。

^② 海洋发展战略是现代用语。近代以来大国崛起过程中制定的面向海洋的种种措施和制度，可以统称“国家向海发展的战略”

荷兰、英国和美国，海上强国之路一再印证着国家政府的重要作用，政府必须明智坚毅，始终对海上方向进行周密的筹划和做长期发展的考虑，才能保证国家海上方向的持续发展。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海洋贸易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也是长久支撑强大海军的动力，因为优势的海上安全环境是建立在健全的海上贸易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此外，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是，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海上强国不仅有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也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主导着世界经济的领先产业。^①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实力地位，间接而又深刻地影响着海上安全环境。

上述五类要素是影响国家海上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并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地位的兴衰。

第二节 主要大国崛起过程中海上安全环境考察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相当程度上是记载人类对水的认识和利用的历史。然而，在四五千年前，尼罗河上泛舟与地中海上扬帆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后者已成为生存致富的主要手段。两种文明——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从此拉开了距离。受商品经济规律支配的海洋文明充斥着海洋国家间由贸易开启的经济利益冲突，那些濒海国家要维持海上通道、保护自己的贸易市场和商业利润、进而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都力图在确保本国海上安全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谋求对海洋的控制。如果说，海权是近代大国崛起的助推器，那么，大国崛起过程中能否拥有一个相对安宁的安全环境，便成为生存并谋求长远发展的关键。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中相继建立起了强大的舰队，为了世界贸易、新发现地区或殖民地的特权相互竞争，并先后成为世界性的强国。分析这些国家崛起过程中海上安全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既具理论价值，又具现实意义。

^① 曹云华、李昌新：“美国崛起中的海权因素初探”，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5期，第24页。

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具有大致相同的地理位置，一面或两面环海，在早期地理大发现和商品经济发端时期占据着海上优势，并率先成为16世纪、17世纪的世界强国。

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这个面积和资源都不比中国福建省大、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小国，以当时不到100万的人口，拉开了人类大航海的序幕，使相互隔绝的各大洲联系日益紧密，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奇迹般地崛起成为西欧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一度与西班牙瓜分了整个地球。1419年，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派出了第一支探险队，1494年，葡、西签订教皇子午线，对世界进行了瓜分。16世纪中叶，在早期殖民掠夺和殖民扩张中抢得先机的葡萄牙，打破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的传统垄断，垄断了世界上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控制着跨越半个地球的商业航线，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帝国。受其影响，欧洲的权力中心也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转移到了伊比利亚国家。相比于葡萄牙，处于同一个半岛的西班牙，领土面积不仅较为广阔，而且占据着伊比利亚半岛的绝大部分，并完成了最先由葡萄牙人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1492年哥伦布首先发现了美洲，1522年麦哲伦又完成了环球航行。期间，西班牙奉行“先占原则”^①这一欧洲强盗逻辑，开始了野蛮的殖民征服和贪婪掠夺。从15世纪末开始，西班牙先后征服西印度群岛、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凭借殖民美洲所获得的财富，西班牙很快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还建立了一支号称拥有100多艘军舰、3000余门大炮、数以万计士兵的“无敌舰队”，以保护其海上交通和海外利益。依靠这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西班牙昂首于世界，其经营的跨洋贸易，1510—1550年间增长了7倍，1550—1610年间又增长了两倍。^②

然而，葡、西两国并没有崛起太长时间。无尽的享乐主义、奢侈之风以及猖獗的海盗活动，使得两国的贸易垄断体系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欧洲本土和地中海海域经历的一场场战争，也使两国耗尽了财富。1588年“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覆灭，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从此成为历史。总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兴衰历程，可以发现两国的

^① 当时的国际法规定对领土的取得是“先占原则”，即谁先发现谁占有。这本身就是欧洲人的一种强盗逻辑，因为当地已有居民居住，欧洲人无权排除他们的权利。

^② 张炜、许华：《海权与海军》，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兴衰有着大致相同的原因。

第一，寻求财富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追求。^①15世纪欧洲严重的金银荒迫使统治者为了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实施对外扩张。当时对欧洲人生活极其重要的香料主要产自印度和亚洲的南洋诸岛，但15世纪香料贸易通道依然控制在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手中，开辟一条到东方的商路成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想法，这在伊比利亚半岛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葡、西两国上自国王、贵族，下至商人和普通百姓，都加入了旨在寻求海外财富的海外扩张活动。走出国门的航海，与海外的扩张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在关注和追求的持久性的事业。第二，“拯救”灵魂行动成为海外扩张的另一个动力。与世界其他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世主义、改变异端宗教信仰和好战精神。基督教唯我独尊的上帝观和拯救全人类命运的使命感成为传教士运动的内在动力。当15世纪基督教世界面临着穆斯林的巨大威胁时，旨在通过海路沟通东西方、建立反穆斯林联盟的探险活动，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完成上述使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葡萄牙处于两大宗教交锋的第一线，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穆斯林曾建立了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虽然基督教最终驱逐了穆斯林，但两大宗教对垒仅隔一条最窄不过13海里的直布罗陀海峡，穆斯林随时都可构成威胁。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葡萄牙比半岛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有着更强烈的紧迫感。第三，两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均早于欧洲其他国家，这使得这场对外的扩张运动得到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的国力支持。两国在历年的对外扩张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陆军和海军，对其扩张运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上述两个帝国衰落原因一部分因外部因素所致，如没有把获取的巨额财富，用于巩固国家的防御力量，未能实现保护海上利益与促进国家发展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但根本上源于其内部。对葡萄牙来说，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战线太长，“敌人”太多，自身人口过少，导致兵力不足；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农业凋敝；对香料贸易的控制远远达不到独占的程度；国内享乐之风盛行，香料、奴隶贸易和海外殖民活动并没有给葡萄牙带来生产的高涨，财富不是用来投入生产，而是投入消费。1580年，忙于欧洲战事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继承葡萄牙王位，未能采

① 寻求财富是指寻找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香料。

取有效措施维护葡属殖民地，葡萄牙多年经营的殖民体系趋于瓦解。当1640年葡萄牙最终摆脱西班牙的统治时，葡萄牙已不再是一个强国。西班牙帝国的规模和实力远强于葡萄牙，但帝国衰落如同兴起一样，也主要是由于其自身原因，例如追求天主教帝国的虚荣，疯狂镇压“异端”；为扩张而进行超负荷的战争；国家的精英阶层普遍存在浮夸文化观念，享乐主义如同葡萄牙一样横行。更为严重的是，西班牙当局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更是导致了西班牙在帝国发展道路上无法长久下去。轻视工商业生产不仅是贵族的偏见，也是普通城市市民的偏见。大量的西班牙人逐金银而居，纷纷走出国门，企图通过淘金一夜暴富。奢侈品的高额利润及拥有大量财富的殖民者对奢侈品的大量需求，促使大城市的手工业者纷纷选择转向奢侈品生产。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及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欧洲其他国家物美价廉产品涌入国内，严重冲击了西班牙国内同类产品，西班牙城市手工业难以为继；美洲金银的大量输入在国内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引发了“价格革命”和通货膨胀，西班牙失去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不过，抛开两国殖民掠夺的性质和兴衰历史不谈，两国早期拓展的行动意义非凡，它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改善了人类的知识结构，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使本来相互隔绝的世界联系起来，并由过去的孤立村落因海道相连而成为地球村，世界从此发展为一个体系。

葡、西之后荷兰的兴起则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对传统经济模式的胜利。荷兰在历史上原属于尼德兰（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地区，有17个省），尼德兰本意为“低地国家”。尼德兰北方各省中，以荷兰最为先进。荷兰人是靠海洋起家的，它没有广袤的沃土，处于大西洋沿岸，位于北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要道上，有1200公里的海岸线，有着面向大西洋和英国的良港。早在独立之前，荷兰便有大量的与海洋有关的毛麻纺织业、造船业、捕鱼业和运输业基础，出现了众多的手工业工场。1566年，尼德兰革命爆发，掀起了反对宗主国西班牙疯狂压榨和残酷统治的民族独立进程，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1609年，宗主国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40年后，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荷兰的独立得到确认，为其发展奠定了国家基础。

荷兰独立之时，欧洲正处于商业革命前夕。新航路的开辟，加剧了欧洲与世界各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贸易范围空前扩大，世界市场